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成果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Liangzhu Culture and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周 膺 / 著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Liangzhu Culture and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 周膺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308-07408-7

I. ①良… II. ①周… III. ①良渚文化—研究 ②文化起源(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3988号

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周 膺 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装帧设计 周 膺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印刷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408-7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 88925591

目 录

序 言 文明探源与历史学的技艺	1
第 1 章 良渚文化的生态地缘	9
一、作为考古学文化单位的环太湖流域	9
二、良渚遗址与丘陵湿地二相地缘	21
三、生态压力与适应性反应	32
第 2 章 良渚文化生业与复合经济	41
一、生产性经济的完全确立	41
二、奢侈品与手工业的专门化	54
三、贸易与货殖之利	61
第 3 章 良渚文化聚落与中国最初的复杂社会	65
一、区域聚落与第一古都	65
二、巫政金字塔与玉礼制度	73
三、一神教与地域集团	77
第 4 章 良渚文化的民族学特征	83
一、族群由来	83
二、传说稽考	95
三、文化圈与播化	103
第 5 章 良渚文化的心灵镜像	107
一、俄狄浦斯王	107

二、亡灵书	114
三、美学意象	120
四、新话语	130
第 6 章 良渚文化在龙山时代的构建性	143
一、龙山时代的纲领	143
二、交往与耦合	153
三、玛雅—中国连续体	163
第 7 章 文化进化论意义上的良渚文化	171
一、文化进化论论域中的良渚文化	171
二、文化相对论与良渚文化	183
三、作为特殊文明体的5 000年史证	187
第 8 章 后现代考古与良渚学	197
一、知识考古学	197
二、新生态学	209
三、重写文明史	217
主要参考文献	227

序 言 文明探源与历史学的技艺

“文明”一词最广泛、本质地涵盖了人类历史的特征。正如塞缪尔·P. 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言：“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埃米尔·德克海姆 (Emile Durkheim)、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Oswald Spengler)、皮季里姆·A. 索罗金 (Pitirim A. Sorokin)、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阿尔弗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罗伯 (Alfred Louis Kroeber)、菲利普·巴格比 (Philip Bagby)、卡罗尔·奎格利 (Carroll Quigley)、拉什顿·库尔伯恩 (Rushton Colbawn)、克里斯托弗·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夏莫尔·诺亚·艾森施塔特 (Shmuel Noah Eisenstadt)、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威廉·H. 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阿达·博兹曼 (Ada Bozeman)、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

¹塞缪尔·P.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23页。

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¹亨廷顿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和最高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特征。以文明为单位来书写人类历史，可能是描述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所采用的最好的统摄与说明方法。文明的差异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不会立即消失，比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权的差异更深刻。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则以书写文明史的方式来揭示人类历史上的沧桑巨变和兴衰存亡，他们认为人类世界就是人类文明史。

文明史书写的出现，表明人类逐渐走向对历史的更深的和更本质的把握和认识。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还是来自于存在力量的逼迫，这种书写都在变得越来越强劲。在当今时代尤其如此。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自己的过去，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环境、经济、族群、国家、语言、艺术、宗教等。而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历史。从物质的、精神的方面来开展文明对话，已成为人类在这个有限的星球上和平长远地相处下去的最佳方式。人类已普遍地认识和感受到，只有告别自恋情结，推倒自我为中心的围墙，构建健全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真正取得进步和发展。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用一种普世性眼光和态度去看待人类多个文明的历史，已逐渐成为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和新模式。以往那种以自己民族、国家、区域或特定的文明形态为中心来书写历史的方法，至少从表象上已日遭摒弃。诸如区域史、国别史或民族史的划分与写作，其局限性和缺陷日显，因为它们无法从整体上本质性地描述人类历史的复杂演变与曲折变化。以全球化眼光观照文明发展，与其说是一种进步，不如说是一种生存之道。

但是，对文明的理解却是个难题，对文明本质的说明就如同说明宗教信仰、人生价值一样困难。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一书中指出，之所以无法去探究宗教的本质，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本质供每个个体去参照理解。传统史学将文明简单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或物质、政体和精神三个层面等，从技术层面帮助我们理解文明的本质和价值。器物层面是指人类在建造自我世界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实体，它是文明外在的表现形式。政体层面是组成人类社会的内在体制和模式，它包括法律、制度、规范和政治、经济以及军事

等组织。精神层面则是文明的核心，包括价值体系、宗教信仰等。一种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两个层面的特征。但这种对文明的描述已经很难满足当下的人类对文明理解的需要。斯宾格勒认为，所有人类文明的内在结构分为文化灵魂和文化形式语言两个层面。文化灵魂是每个文明内在的特质与精神，它决定了文明的独特风格与历史形式；而文化形式语言则是表达文化灵魂的具体方式，它包括诸如国家、政治、军事、宗教、哲学、建筑、艺术等，甚至还包括该文明所位处的自然形态，如森林、草原、河流、动物、植物等。文化灵魂在本质上又属于某种神话传说或宗教信仰。“对于每个人来说，不论他属于哪一种文化，心灵的要素就是一种内在神话中的神祇。宙斯是对于外在的奥林波斯山而言的，*vous*（努斯）是对于内在世界而言的，每个希腊人全都知道他拥有的这种东西，是其他心灵要素的加冕之王。‘上帝’是对于我们而言的，上帝作为广袤的世界、宇宙的大能、永远在场的创造者和提供者，也就是‘意志’——从世界的空间到心灵的想象空间都有所反映，且必然是作为一个实际的在场被感觉到。”¹汤因比将文明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并指出：“我相信，文明的类型是通过它的宗教来表达的。我极为赞同宗教是一种动力源的观点，宗教使文明产生，又使文明存在下去。”而所谓的“西方的没落”，指的是一种精神活力的丧失。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已由文明状态蜕变为僵化的文明外壳，而汤因比则认为，西方文明的衰败恰恰来自于西方人的信仰危机：“每当一个民族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它的文明就会屈服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外族的军事进攻。失去信仰的文明就会衰落，然后就会被受到另一种不同宗教激励的新文明所取代。”²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谓的文明也是以宗教信仰为衡量标准或归属单位的：“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³在当代历史学境域中，文明更多地被理解为与人类存在相关联的活的精神史或心灵史。由此我们看到，当今时代对文明的思考已经走向一种终极的玄冥之思。

对文明的理解影响到对历史学可能性的理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提出，所有历史学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如何，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

¹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形式与现实》，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00页。

² Arnold Joseph Toynbee & Daisaku Ikeda, *The Toynbee-Ikeda Dialogue: Man Himself Must Choo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³ 塞缪尔·P.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¹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ix.

²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2.

³Patricia O'Brien, Michel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37.

⁴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PAST AND PRESENT*, 85, 1979.

⁵Karen Halttune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Narrativ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66.

⁶Mark Pos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

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¹维多利亚·E. 邦奈尔 (Victoria E. Bonnell) 和林·亨特 (Lynn Hunt) 指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²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集合了以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历史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历史实践仍然是个问题。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道路——“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³历史学家借助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或经济—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回到了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的审美判断。

但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史的叙述方式。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二是如劳伦斯·斯通 (Lawrence Stone) 所说的“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⁴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而后现代历史学则承认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并在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⁵。马克·珀斯特 (Mark Poster) 指出：“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地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⁶这些思想代表了当今历史学的最新认识。

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领域出现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思潮，即文化生态学和新文化史学。

文化生态学是20世纪50年代由人类学家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探讨的是

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90年代以来,其中的“生态”概念被扩展到广义的人文生态范围。来自人类学、生态学、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从多个角度分析由于信息革命所造成的新媒体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但近几年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又促使人类重新回到原初的文化生态学上来反思历史。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朱利安·H. 斯图尔特(Julian H. Steward)提出的三个文化生态学研究基本程序,主要着眼于文化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重点阐明不同地域环境下文化的特征及其类型的起源,即人类集团的文化方式如何适应环境的自然资源、如何适应其他集团的生存,也就是适应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以此解析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环境、技术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分析,所以对今天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在文化面前出现的危局仍是可借鉴的。斯图尔特提出的三个基本程序是:1. 必须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2. 必须分析用特殊的技术手段开发特殊地区中的行为模式;3. 必须弄清行为模式在开发环境中影响其他文化所具有的作用程度。¹斯图尔特将特定环境与特定的人类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将区域“文化内核”确定为特定环境与人类生存或经济行为关系中最密切的那部分文化,并认为对其必须进行详细研究,都极具前瞻性。

¹朱利安·H. 斯图尔特:《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世界民族》,1988年第6期。

新文化史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相对于传统史学来说是全新的,大致分为五个方面:1. 物质文化的历史,如食物、服装等;2. 身体、性别的历史;3. 记忆、语言的历史;4. 形象的历史;5. 政治史,主要是非正式制度。新文化史学对新史料特别关注,如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被发掘为史料;对于传统史料,如官方文件等,则以新的方式来阅读,以找出其表达特征与内涵的偏颇。从其研究方法来看,新文化史学具有前述诗学历史学的特质。它反对“科学的”历史学。彼得·伯克(Peter Burke)甚至极端地说:“据我了解,西方学界很少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我所认识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这样认为。他们可以是传统的政治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但是,没有任何人敢自信地称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几百年前你去剑桥,人们会说,‘是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史学家已经抛弃了这一观点……许多人认为历史是一门艺术,一种你不自由创造任何事情的艺术,一种与史料有关的艺术……很少人会同意海登·怀特的说法:‘对历史的叙述没有区别。’另一方面,他们不想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想说历史是一种与事件、证据等史料有特殊关系的故事……历史学是Wissenschaft

(科学)，但不是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在英语中这两者不易区分。我们说的不是一般的西方历史学家所说的含义，我们不喜欢客观的历史学。因此，我写法国革命史，您也写过法国革命史，您的写法会有许多不同，因为我们的个性不同；我们使用同样的史料，但是我们的描绘不会相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能谈论科学。但是，历史学家仍能有或多或少系统的方法。即使使用这种方法，我们所有的人也不能得出完全相同的结论。所以，新文化史学家不拒绝历史方法的有效性，只是他们与几百年前的历史学家对结论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所有的结论都是暂时性的。”¹

¹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这种历史学写作态度使人联想到年鉴学派的重要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一些说法。在这本书中，布洛赫谈到如下一些问题：历史学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它研究的合适对象是个人还是人类，它是科学还是艺术，社会科学家是否有权利满足于将当代的解释局限在当代，现实是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无意识的史料为什么更重要，历史学的目标是褒贬历史还是理解历史，等等。这些问题一向更为哲学家所关注，但布洛赫并不认为自己的思考是哲学视角的，他将自己工作的目标看作是试图解决同行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他谦称自己的书“只不过是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在谈论一系列历史学家的技艺之后，他却指出：“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孕育着困难，又包含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理解的作用不仅限于此，“理解包括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包括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²而当戈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走出来，转向对德国帝政时期的古代文献和古代记事的解读时，他感受到了“知道特异事物后的喜悦”。布洛赫提请我们注意，不要将学问中这种诗意的部分抽取掉。那种认为历史学因为对感性具有如此强烈的魅力而不能满足我们的知性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似乎更应该将历史学理解为一种哲学或艺术，而不仅仅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是有可能“科学”的；哲学或艺术的历史学可能比科学的历史学更准确、更根本。伯克又曾指出：“在历史的连续和断裂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可能更多的变化发生在巴黎，乡村变化相对较小。总体上来

²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8、105页。

说，新文化史的写作正是认识并揭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试图在文化和心态上找到连续和断裂的相对的平衡点。”¹“连续和断裂”是文明史研究中的一个论题，曾是张光直区别中西文明特征的一种理论概括，但它也是一个难以绝然论断的问题，需要找到其中某个平衡点。而“在文化和心态上找到连续和断裂的相对的平衡点”，也正是历史学研究的智慧。虽然布洛赫和伯克都声称自己的历史思考不是哲学思考，但事实上他们对历史学的技艺作出了十分哲学的或诗化哲学的解释。事实上，人的合理的生存除生理的自然性一面外，在人文上即应是一种诗学的存在、美学的存在。这也正是当代文化生态学的新意境。

本书的论题是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却反对关于起源的探讨。他把“起源崇拜”称作“起源的迷惑”，把“起源的偶像”称作“史学家部落的偶像”。“起源”所指的“开始”或“原因”是不可求解的，它不能建立在特定的时间段上。而“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²但人类无法放弃对起源追溯的兴趣。事实上，这也正是对开始与原因追问的兴起。和新文化史学所说的一样，文明探源不可能是“科学的”，但却可能是哲学的、艺术的。不仅“人酷似其时代”，历史同样可以酷似我们这个时代，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也蕴涵于当今时代和当今人类。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探源也才是真正科学的。

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未必是长时段的，也可能是前述专门史意义上的研究，它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新文化史学微观史论之功。在怀特看来，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文学修辞上的提喻法（Synecdoche）。它以局部代表整体，以特殊代表一般，“通过提喻的修辞法……有可能在一个整体中的整合的形式建构起两个部分，它在质上不等于部分之和，在其中的各个部分只是微观化的复制。”³微观史学研究极大地依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并且受到福柯思想的巨大影响。首先，微观史学所试图建立起的是一种微观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对象是过去历史中的那些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信仰、意识、习俗、仪式等文化因素，它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宏观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只是作为讨论的背景，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其次，人类学或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在方法上也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而其结论又能放大到更广阔的范围

¹杨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²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³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5.

中。如吉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仪式的文化解释，便可以衍伸开作为一项普遍性的结论。再者，“厚描述”的方法并不只是简单地将观察到的现象套用到某种理论框架中，而是“从一整套象征性的符号出发，并试图将它们置于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于是厚描述用书面的形式记录下一系列否则就会转瞬即逝的象征性的事件或事实。不过它们可以被放在语境之中得到解释，也就是说，在大量的社会话语中，这种方法成功地通过对最微小的事件运用微观分析的方法而获得最重大的结论”。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指出：“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来说明我们如何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¹良渚文化之于中国文明为微，但此“微”为源、为原之一。我们期望良渚文化研究之于中国文明的探源能以“厚描述”见重，以微见著，以微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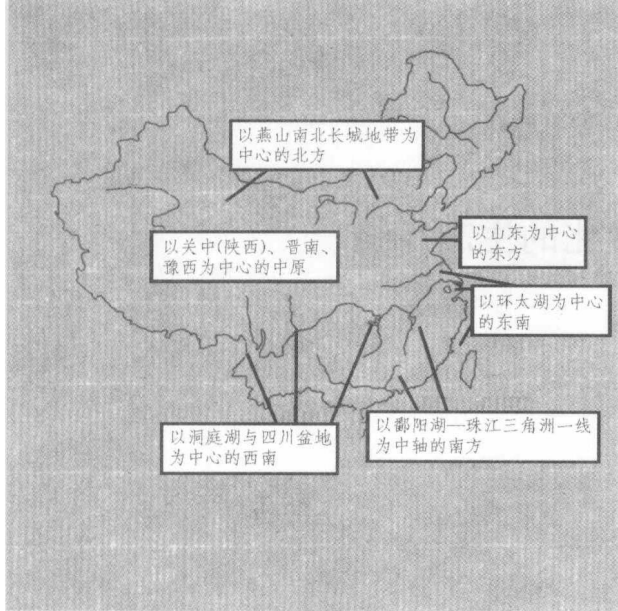
¹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P.102, P.110.

第1章 良渚文化的生态地缘

一、作为考古学文化单位的环太湖流域

苏秉琦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 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今日“中国”所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个文化圈的空间，蒙藏、中亚、西南山地及沿海岛屿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苏秉琦提到的区系是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几个大地区，不但资料多，发展的线索也较为清楚，而其区系理论大体可以反映中国新石器文化聚合和文明发育的过程。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即长江下游考古学文化区系。长江下游一般指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九江、湖口至上海长江口区段，全长840km；按行政区域划分，包括安徽、江苏的沿江地区 and 上海全境、浙江北部；从文化影响关系来说，还涉及江西北部 and 湖北东部一部分地区以及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地区。目前以长江三角洲河口地区为核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经济集中度和贡献率最高的地区，也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之所在。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环太湖流域崛起为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的高峰，构建了龙山时代的文化纲领，并在全新世中期（6 000—5 000aBP）逐渐过渡为中国最早的文明体。



苏秉琦提出的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引自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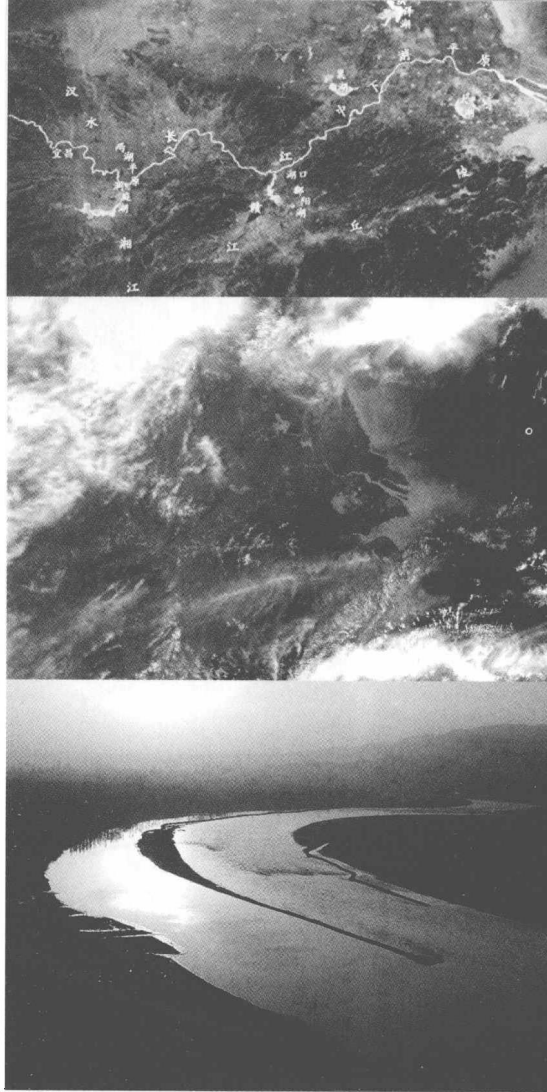
长江下游又可以划分为西部苏皖平原和东部长江三角洲平原两个亚区。前者西起鄂、赣、皖交界处的九江或湖口，东至镇江和扬州一线。其内部又分为宁镇丘陵和皖中平原两个地理单元，而皖中平原又包括巢湖平原和九江至南京之间的长江沿岸冲积平原。后者概指镇、扬以东地区，有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以及长江以北的苏北里下河平原等地理单元，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区域范围。其北界由仪征向东，沿扬州、泰州、海安至栟茶。其东濒临黄海和东海。从仪征向东南，沿茅山、天目山至杭州湾以北为其西

界和南界。环太湖流域属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由苏南平原和杭嘉湖平原构成；北临长江，南抵杭州湾及钱塘江，西依茅山和宜溧山地，东濒东海，包括上海、江苏东南部和浙江北部，总面积30 340km²。在长江下游东、西两大平原中，长江三角洲平原是以平原为主的区域，而苏皖平原却丘陵和平原兼有，呈现着此不类彼的差异。皖中平原由于被夹峙在丘陵山地之中，显得狭小而纵长；太湖流域的平原则因为地处河口，形成了大片广阔的泻湖性地貌。可见，长江下游虽然都是以平原为主体的自然区域，但各平原之间的相对差异仍然存在。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碟形洼地中心，湖岸西南部呈半圆形、东北部曲折多岬湾，面积2 428km²，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除局部地区存在古河道和洼地之外，湖底平浅，平均水深1.89m，最大水深仅2.60m，72.3%的湖底水深在1.50m~2.50m之间，是典型的浅水型湖泊。太湖接纳苏南茅山山脉荆溪诸水和浙北天目山脉苕溪诸水，主要由黄浦江泄入长江河口段。根据地层剖面、地貌形态、考古遗址和历史资料分析，太湖及其附近地区自晚更新世末期以来，由于地质内外营力共同作用，由沟谷切割的滨海平原景观演变为碟形洼地泻湖。

晚更新世的玉木冰期造成全球性海退，15 000aBP海岸线退至东海大陆架边缘水深155m处；此后随着气候转暖，冰川消融，海平面迅速回升；至10 000aBP，海面已上升至目前海面下30m~40m。当时长江三角洲覆盖着一层晚更新世末期陆相褐黄色硬粘土层，此硬层构成自西向东倾斜的太湖平原全新世原始地面。其高程在茅山以东、金坛一带构成3m~5m高地。奔牛一带出露地表，常州、无锡一带为-1m~2m左右，太湖东部、苏州、吴江等地在-2m~-5m之间，昆山在-5m以下，上海东部地区为-25m左右。其时，滨海

平原北部的长江谷地下切深度达50m~60m,南部的钱塘江也达40m~50m。长江和钱塘江两岸的大小支谷随之深切,致使长江三角洲南翼成为沟谷切割的滨海台状平原。这时的太湖地区属台状平原的内缘延续部分。东太湖大部分和西太湖部分地表为晚更新世末期2m~6m厚的陆相硬土层所覆盖,地势较为平坦,但在太湖西部的南、北各有一条支谷与钱塘江、长江沟通。沟通钱塘江的谷地从太湖中的大雷山、小雷山之间,向西北延伸过平台山西北,北抵马圩,西出大埔,又西经宜兴、溧阳折北,经长荡湖至金坛;同时又有一支向南经湖州、荻港、东林、戈亭至杭州与钱塘江交汇,深度达15m~25m以下。太湖西部诸水大多经此支谷南流注入钱塘江。北部沟通长江的谷地较浅,从马圩向北经雪堰、前洲、青阳、芙蓉、夏港入长江。太湖西北地区的部分地表径流经此注入长江。¹早全新世初期的9 000—8 000aBP时,海平面继续上升达到-25m~10m,海侵到达长江三角洲顶部的镇江一带,海潮通过太湖西部南、北两条支谷入侵西太湖地区。西南部的钱塘江深切支谷因之演变成为从钱塘江口侵入太湖西部的大海湾,称为“太湖海湾”。海湾北部的马圩是海水从南、北两个谷地入侵西太湖的交汇点。马圩钻孔揭示,在8 700aBP的海相地层中,发现毕克卷转虫变种——光滑九字虫组合,证明全新世初期海水已沿太湖西部南北两个海湾侵入到太湖西北部的马迹山附近,太湖西部的泻湖雏形在这一时段已经出现。此后至7 500aBP前后,海面继续上升到-7m左右,西部泻湖继续向西扩展,金坛至溧阳的茅山东麓洼地、溧阳至宜兴北侧的谷地也已处在泻湖环境之中,因此在金坛、前指、官林、和桥等地均有这一时段的海侵沉积层发现。而常州圩墩遗址在地表以下0.40m~1.50m之间有四个文化层,其最下的第四层属马家浜文化,此层下伏之生土层为灰色分砂质粘土。经微古生物分析属滨海泻湖潮平沉积,说明圩墩在马家浜文化形成之前,环境也属于海侵泻湖的边缘地区。²但早全新世的海侵仅拓宽太湖西部的沟谷地带形成局部的泻湖,太湖大部分以及东太湖地区此时仍为晚更新世末期陆相硬土层所构成的陆地。据吴江西南新淤地菀平钻孔可知,其上层沉积物含有淡水螺壳、芦苇根茎,属于近代湖相沉积,此层之下即为褐黄色硬土层,其高程和太湖底的硬土层相当,属晚更新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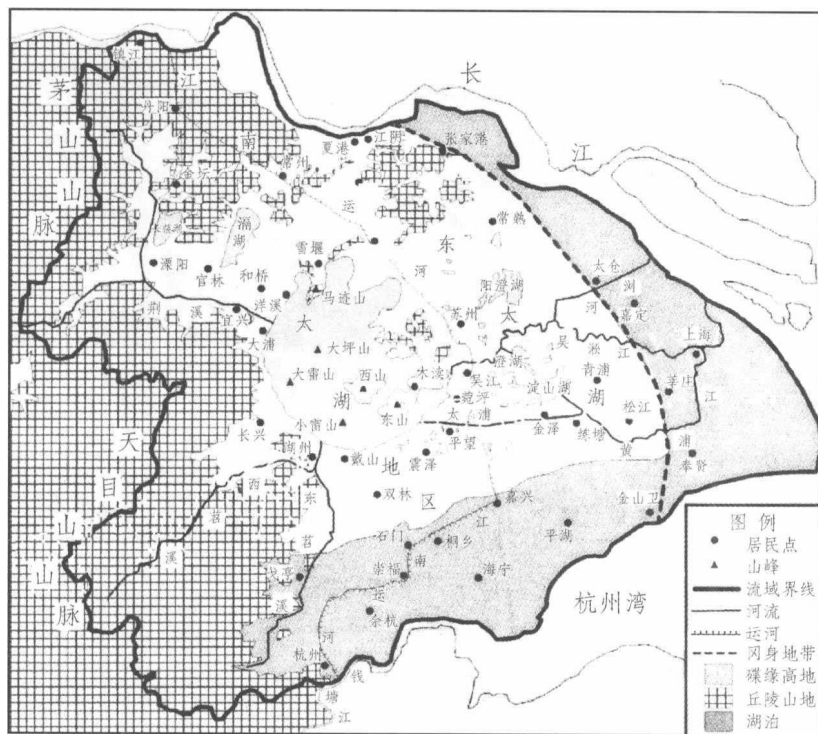
长江

¹洪雪晴:《太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1年第4期;陶强、严钦尚:《长江三角洲南部洮涪湖地区全新世海侵和沉积环境》,载严钦尚等:《长江三角洲现代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²陶强、严钦尚:《长江三角洲南部洮涪湖地区全新世海侵和沉积环境》,载严钦尚等:《长江三角洲现代沉积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太湖航拍图



太湖流域地形图（引自张修桂：《太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辑）

¹洪雪晴：《太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1年第4期。

末期陆相地层；苏州东山、渡村钻孔揭示的湖底上部硬土层与此相同。这说明在10 000—7 000aBP的早全新世，太湖大部分地区仍继承晚更新世末期的滨海平原地貌形态。

7 000—6 000aBP的中全新世早期，气候更加湿热，海面继续上升至接近现代海面高程，海侵达到最大范围，并沿沟谷大举入侵太湖地区，导致太湖及其周边地区海侵。同时，由于环太湖平原的江阴、常熟、太仓、嘉定、金山一线滨岸滩脊（沙冈）的塑造，形成从东部包围太湖平原的碟缘高地，奠定了太湖地区碟形洼地中的泻湖地貌。太湖西北部马圩—夏港间的长江支谷通道口被长江滩脊所封堵，入侵太湖地区的海水主要来自东、南两个通道。南部通道在“太湖海湾”的基础上因海面上升而展宽，大量海水经此北侵，由小雷山进入太湖，淹没西太湖大部分地区，形成位于海湾北部两侧的洋溪、马圩4m厚的同期泻湖相沉积。东部通道大致沿今练塘、金泽、芦墟、黎里、平望一带的太浦河流域，

经震泽侵入太湖东部地区，导致太湖东部和东太湖地区演变为浅水泻湖。湖内牡蛎丛生，发育良好，形成的牡蛎层厚达0.80m。此时，太湖东南岸的双林、戴山等滨湖地区也同时沦为泻湖的南延部分，南岸的九里桥地区发育成为浅水海湾。¹在太湖东、西两侧大部分沦为泻湖的中全新世早期，周边较